

知识社群与主体意识

第

十

辑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九江学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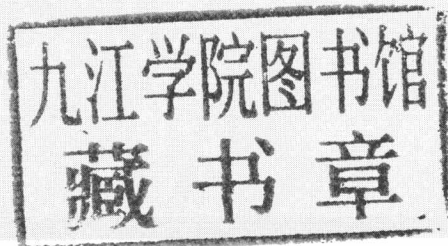
1461578

1457835

知识社群与主体意识

D81/21208

不外借



第

十

辑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社群与主体意识/陈玉刚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10)
ISBN 978 - 7 - 208 - 09863 - 3

I. ①知… II. ①陈…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②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1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7804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十辑 ·

知识社群与主体意识

陈玉刚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06,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863 - 3/D · 1849

定价 25.00 元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2011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辑 / 2011 年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2011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学术委员会

Breslin, Shaun 英国华威大学 (University of Warwick)

Callahan, William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倪世雄 复旦大学

庞中英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王建伟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郑在浩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朱明权 复旦大学

Zweig, David 香港科技大学

秦亚青 外交学院

王正毅 北京大学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编辑委员会

樊勇明 徐以骅 陈志敏 唐世平 潘忠岐 陈玉刚 张建新 胡青心 袁建华

包霞琴 何佩群 蒋昌健 肖佳灵 黄河 薄燕 俞沂暄 沈逸 吴澄秋

秦倩 袁启龙 (John Armstrong) 陈玉聘

编辑部成员

陈明明 陈玉刚 敬义嘉

本辑执行主编 唐世平 陈玉刚 责任编辑 赵荔红

目 录

主题文章

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的武力使用：一项研究议程 /尹继武 1

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社群如何可能？ /石之瑜 张登及 35

国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人性 /陈玉聘 唐世平 57

天下体系：一个中国式乌托邦中的世界秩序 /张 锋 87

“金砖国家”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 /葛传红 93

理论探讨

相互战略保证：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合作构建理论 /唐世平 著 刘
丰 译 唐世平 校订 121

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效应：文献述评与展望 /庠艳湘 163

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的武力使用：一项研究议程

尹继武*

【内容提要】 中国在对外危机决策中可以选择政治、经济、外交和武力(军事)等多种影响力手段。相对于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而言,武力使用无疑是不确定性较高的风险手段。本文试图回答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危机决策中对武力使用风险的接受。在规范性地阐述基于西方理性假定的预期后,本文进一步从社会身份和损失厌恶心理动机层次分析中国为何使用武力而接受风险。影响中国决策者使用武力的因素中,问题领域敏感性、观众成本(面子)、既存现状、个性与情绪(认同)等变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对外关系也经历了“现代化”的革命,亦即中国外交的社会化和理性化占据主导地位,而先前的意识形态化外交已不是外交的中心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对于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经历了从不合意风险到合意风险的变迁。探究中国武力风险接受的变化机制,是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宏观转型的基础。

【Abstract】 China has several influential means in the foreign crisis decision-making progress, such as political, economical, diplomacy and military(force) resorts. Comparing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diplomacy results, the use of force is a risk option with high uncertainty. The paper explores which factors influence the acceptance of the risk that use of force in Chinese foreign crisi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fter a normative illustration of the theory expectation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 why China use force and accept risk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and loss aversion levels. Among the factors influence Chinese decision-making use force, the sensitivity of issue areas, audience cost(face), existing status quo and personality, emotion(identity) play a vital role. With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rocess,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undergo a revolution of “moderniz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ocialization and rationalism character the central feature of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ideology task has reduced its significance. Under those conditions, the risk acceptance to use of force in Chinese foreig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has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undesirable risk to desirable risk. So, the exploration of change mechanism of Chinese risk acceptance to use force has great implica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macro transformation.

*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0502B07)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资助,特此致谢。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北京大学张清敏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蒲晓宇博士、外交学院吴文成博士以及两位项目匿名评审人等提供了资料帮助和中肯的修改意见。

系统整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外交 60 年的基本经验,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界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偏重于宏观体系变迁分析,多数研究集中于宏观战略层次,比如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中国外交的进步与能力建设等,而较少探究微观决策心理与行为特点;继而大部分研究要么是历史过程描述,要么是外交战略献策。^①正如王逸舟所言,“中国外交学界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 30 年间)有关涉我主权冲突的研究和说明相当缺乏”(王逸舟 2008, p. 18)。概言之,我们很少关注研究中国在处理主权冲突问题时的行为特点、进步性和制约因素等相关议题。牛军也指出,由于研究素材和政治限制,中国外交研究中关于中国对外决策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牛军 2007, pp. 19—21)。

基于此,我试图系统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涉及主权问题上,中国对于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问题。换言之,是什么因素决定中国在特定冲突发生时、国际危机升级中决定采取冒险的政策(武力即为一种军事冒险政策)?^②相比于不同历史时期,比如以改革开放前后 30 年为界的危机中,中国对武力使用的接受具有哪些变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首先整理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基本特性,继而综述国内外现有的零星研究,分析他们的进步与不足;然后从理性主义和(文化)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推导出中国外交危机决策中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假设。值得指出的是,我仅进行初步的理论推论和经验假设论证,提供一种研究框架,这属于演绎性和描述性的分析,并不是从具体个案及个案比较中归纳出工作假设。所以,具体验证和比较我所提出的推论和框架,有待于进一步细致的个案比较分析工作。

一、中国对外决策中的武力使用问题

在国际危机和冲突中,国家面对不确定的情境,可以采取多种影响力

① 中国学者对中国外交的优秀研究,可参见(牛军主编 2007)哈佛大学江忆恩(A. Iain Johnston)教授系统评判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见江忆恩,2006,第 64—71 页。

② 对外决策时的风险接受/冒险(risk-taking or adventurism)概念来源于决策理论学,指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对于风险选择的接受与追求程度。其理论基础包括决策偏差理论(相对于理性决策而言)以及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等。参见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主编(2008)、Richard Nisbett and Lee Ross(1980)。

手段。^①国家可以采取理性外交手段进行谈判,利用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双边和多边的场所进行沟通;或者国家也可以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对方改变现行政策,达到实现自身影响力的目的。相较于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武力(军事)手段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暴力手段(当然武力具有不同的等级)。对上述几种方式的选择,就是国家在冲突处理和管理中影响力手段选择的问题。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手段选择机制,而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手段选择。在同一个案中,国家总是从多种选择机会最后走向一种最终选择(当然即使是武力手段的实施,也不排除其他手段的同时进行)。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选择武力冒险的手段,而有的国家则愿意日复一日地谈判解决问题?为何国家在处理危机决策中使用武力手段?中国的情况呢?这就是,在我们所设定的问题领域,亦即国家涉及国际危机与冲突时的政策与手段选择时,国家对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问题。

1. 武力使用与风险偏好

在分析中国对外使用武力时,一些相关概念的辨析极为重要,如国家间军事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MID)、危机和战争等。从概念的外延来说,国家间军事争端所包括的个案最多,而战争的界定最为严格;国家间军事争端可以升级至危机、使用武力,以至于爆发战争的地步,但也可以是仅仅局限于军事对峙和政治外交交涉的程度。根据密歇根大学战争相关(correlates of war)数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49年到2001年,新中国所经历的国家间军事争端共有145次,而爆发战争的次数很少,仅包括朝鲜战争、中印边界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冲突和中越自卫反击战等(图1)。^②就国家间军事争端的分布频率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冷战结束前后两个时段,中国的涉外军事争端较为集中。对于武力使用的概念,较为简略地界定如下:对外使用武力,是指相关国家处理国家间军事争端时,在危机升级过程中,为实现一定的政治或军事目标,使用军事(武力)手段作为解决危机的一种策略。这里可以看出,武力的使用仅是一种策略,而并不代表危机是否升级。武力的使用也并不必

① 罗伯特·阿特分析了武力的四项基本功能,即防御、威慑、强迫和加强威望的虚张声势,(见 Robert Art, 2008, pp. 153—161)。谢林也对武力和外交的功效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参见 Thomas C. Shelling, 1966)。

② 统计数据源自笔者对密西根大学国家战争相关系数数据库的总结,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江忆恩对1949—1992年间的中国涉外军事争端的频率、争端类型、敌对程度得分等相关维度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1998)。

然自动解决危机。在很多情况下,武力使用甚至意味着濒临战争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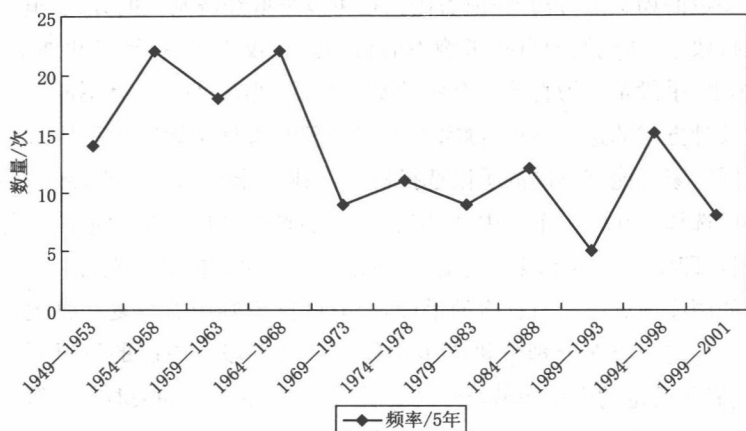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涉外军事争端的频率(每5年标准)

如果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对外关系危机处理过程中,武力使用是促使危机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仅靠理性说服与和平外交来处理国家利益的冲突,可能效果并非十分理想;但同样大量的历史经验表明,武力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不仅无效,而且严重加剧国际争端,甚至引发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亦即我们不仅需要探究国家为什么会接受武力使用的风险,也应分析军事力量和武力威胁如何在可承受的代价和风险的情况下,实现不同类型的对外政策目标?(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 2004, p. 358)因此,如果使用武力,那么危机升级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大,危机的后果与影响面也就相应增大,从而风险就更高。这里,其实可以把使用武力看作是危机处理过程中,(主动或被动)接受风险的一个重要标识。通过这种问题转换,武力使用也可以从风险管理分析的层次加以探讨。具体来说,国家在处理对外军事争端时,为什么会接受风险,而在另外一些个案和时期中,为何拒绝风险,即没有采取以武力手段,进而危机升级的策略。进一步来说,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对于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存在差别吗?人类的风险接受倾向是普世性的吗,即不会受文化、官僚政治及领导者个性的影响?当然,武力使用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和确定性有利于分析与研究,亦即在某次危机中,相关领导者使用了武力或没有使用武力,这是一目了然的。相反,风险接受的偏好,这是一个社会心理的概念(偏好概念更多地 in 经济学和心理学中使用),其概念化和可操作性又具有一定的内隐特征,所以客观上具有一

定的难度。^①综上，我们对武力使用和风险偏好等相关概念进行了初步梳理。

2. 中国对外决策中武力使用的特性

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余年，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过程中，在为数众多的涉外危机中，只有少数几次如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中印冲突、中苏冲突和中越战争中使用武力即接受冒险政策（表1）。宏观整体观察而言，从

表1 中国对外危机决策中的武力使用（1949—2001）

事 件	危 机	时 间	中国初始反应	中国总体反应	其他危机行为者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Ⅰ	1950.6.25—9.30	政治性	非暴力军事	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朝鲜战争Ⅱ	1950.9.30—1951.7.10	军事	军事	南北朝鲜、美苏
	朝鲜战争Ⅲ	1953.4.16—7.27	政治	多种，军事	美国和南北朝鲜
中印争端	中印边界Ⅰ	1959.8.25—1960.4.19	军事	多种，军事	印度
	中印边界Ⅱ	1962.9.8—1963.1.23	军事	军事	印度
中苏争端	珍宝岛冲突	1969.3.2—10.20	军事	多种，军事	苏联
中越冲突	中越战争	1978.12.25—1979.3.15	军事	军事	越南
	中越冲突	1984.4.2—6月下旬	军事	军事	越南
	中越边界	1987.1.5—8	军事	军事	越南
	南沙群岛	1988.3.14—4月底	军事	军事	越南
中美危机	撞机事件	2001.4.1—7.4	政治	政治	美国

资料来源：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2005, 38)；以及本文作者自己的整理。撞机事件不属于风险接受的个案。

① 感谢一位匿名评阅人提出这一点。确实，在分析对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上，将武力使用的原因转换为社会心理变量，亦即风险接受的偏好，这客观上增加了研究设计的难度。但是，由于作者的研究意图在于（文化）政治心理分析，而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关于风险接受问题的研究，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风险接受偏好分析已有大量成果，包括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但政治科学领域，现有的应用尚不多见。可参见 Jonathan Mercer(2005)、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编著(2005)和奥尔特温·雷恩、伯内德·罗尔曼编著(2007)。

数量上看,相较于中国前30年较多采取被动或主动接受风险行为,后30年来武力的使用呈大体减少趋势。就具体时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间中国主权问题冲突较多,接着后20年稍减,而改革开放初期又增多。与冷战后世界地区冲突增多相比,中国实际的主权冲突尚不多,这是否说明未来中国在主权问题上风险接受偏好将下降呢?^①上述诸种特点,是由以下几点原因决定的。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统一事业并没有完成,相关的领土争端也较多,边界划分也尚刚刚开始。这样就造成潜在的冲突“机会”较多。其次,就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中国对于领土完整性的敏感性特别强烈,同时,这也是新中国获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身份的必备基础。换言之,只有中国具备保护自身领土完整,同时维护国内稳定与合法性的能力,中国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自信地走向国际社会。这说明对外使用武力,可能具有确定自身合法性,获取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的“自尊”需求。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先前获取国际社会尊重和认可的动机可能让位于其他的深层心理需要。因而,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日益频繁的当下,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原因就大大不同了。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包括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影响领导人对武力使用的深层心理动机主要体现在追求承认方面,首先是一种国家身份(国际法意义)的认同;其次可能包括一种特定动机,即传统中国世界理念的隐形作用。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权力相对位置)的不断上升,中国面临着如何获取国际社会(美国等强势或霸权集团)的认可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中国权力(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的尊重。^②这说明,在分析中国对外使用武力,对风险接受的偏好程度时,过去的行为并不一定能预测将来的行为,过去中国的行为模式并不必然就是未来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模式,因为前后的动机与需求差异甚大。由此,分析中国对外使用武力时,必须注意中国行为动机的动态性和静态性。中国武力使用风险偏好的降低,可以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理论与和谐世界建构的一种有力理由,这一论断能否成立,仍需仔细检验。由于中国不断融入现行国际社会并自身权力的客观增长,所以揭示中国在对外决策中对武力使用的风险接受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因为未来中国的国际意图、战略思

① 美国学者傅泰林认为,中国在处理涉主权争端问题时更多的是采取妥协的态度,而不是进攻的军事冒险政策。相关的分析见 M. Taylor Fravel(2005, pp. 46—83)。

② 关于冷战后中国对外政策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动机,精彩的分析当属邓勇教授(Deng Yong, 2008)。

考等不确定性因素,实质上涉及中国权力增长与武力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基本政治目标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首先是“领土型的”武力使用目标,亦即中国使用不同层次的武力,是为了改变或捍卫领土的现状;其次是“政策型的”武力使用目标,亦即中国使用不同层次的武力,是为了改变相关国家的政策;第三是“政权型的”武力使用目标,亦即中国使用不同层次的武力,是为了改变他国政府的性质,或维护本国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Alastair Iain Johnston 1998, p. 5)。如果就具体个案来说,从1949年到1992年,“领土型的”目标占据绝大多数的比率(49%),其次是“政策型的”政治目标(42.3%),最后的“政权型的”政治目标较少,仅为7%左右(Alastair Iain Johnston 1998, pp. 11—12)。

此外,领导人对于冲突本质的观念、对于问题解决方式与手段的选择,均存在较大差别。这既是战略文化研究的相关内容,同时也是与领导人的革命意志与信念紧密相关。一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由于在革命与斗争的环境中成长,所以对政治领域本质的认识是革命性,更具有使用武力的意愿;相对于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当然有学者认为并不具有攻击性),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更具现实主义的色彩。到第三和第四代领导人,合作与融入成为主导的政治信念(冯慧云 2009, pp. 36—58)。所以,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由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转变。^①当然,武力使用一般与决策者(国家)本身的权力地位,亦即相对权力因素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举世无双的霸主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对外武力使用的基础。但观察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历史,或许会发现,中国的相对权力地位,与对外武力使用情况并非正性的相关关系。相反,当中国处于权力相对弱势情境时,或许更易于使用武力,因为这与武力使用的目的直接相关:弱者要获得合法性、认可和自尊,所以武力使用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区域体系)互动过程中的手段选择之一。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在权力相对弱小时,反而对外战略上实施“两个拳头打人”。这一特性在毛泽东时期表现尤其明显。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包括政权稳定性、政权类型可能会影响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偏好。这一推论,具有系列的西方理论基础,比如民主和平论,亦即国家的属性——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

^① 唐世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事实上实施的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外安全战略。(唐世平,2008)。

争(不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反之,非民主国家对武力的偏好较重。同时,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状况,亦即政权稳定情况、政治合法性要素会影响对外武力使用的概率。换言之,武力使用或许成为巩固国内政权稳定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基于逻辑的推论,是否成立,仍需在个案中仔细检验。

最后,影响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因素为观众成本(audience cost),包括国际和国内观众成本。事实上,观众成本因素与中国独特的面子文化,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而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中,很大程度上,获得国际威望(类似于面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国际观众成本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联盟价值,是中国领导人必须重点考虑的一个观众成本因素;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影响日趋下降,中国在特定问题领域的承诺可信性、国际尊严的护持,应该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重要观众成本因素。在国内层面也是如此,比如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所以在主权和领土分离问题上,领导人承受的观众成本代价较大,由此会影响领导人对于武力使用的选择。当然,中国的面子文化不仅仅承受着观众成本的代价,而且涉及领导人的内心情绪体验,亦即如果“丢面子”的话,则会体会到一种羞辱的感受。从而为了规避内心的消极情感体验,武力使用可能成为政策的选择之一。综上,我们简要探讨了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一些基本影响武力使用选择的要素(见表2)。

表 2 影响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要素

要 素	强度(强、中等和弱)	结果及简要说明
国家不安全(比如新中国早期, 1949—1956 以及 1958—1962)	强	极易导致使用武力,导致冲突
领土争端	强	较易
革命信念	强	较易
相对力量	弱	较弱,近非相关,但不确定
一体化努力	较弱	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
国内政治(政权类型、政权不安全等)	中等	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视具体情况而定
观众成本(国内和国际)、面子文化	强	特定领域影响较大
被尊重的愿望(权力认可) Vs. 被承认的愿望(国家承认)	强	较易

3. 对既有研究的综述

到目前为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尚未系统研究中国对外武力使用问题,相关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具体个案做过详细的分析;仅有的例外是,石之瑜从中国文化特性出发,大多基于深层心理和动机的分析,指出中国对外武力使用更多的是获取心理目标,而非利益诉求,因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战争(Jonathan R. Adelman and Chih-Yu Shih 1993)。个别学者研究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认为对象国的政策决定中国的政策反应,比如对方扩张则中国强硬(可能使用武力),对方维持现状则中国宽和(采取非武力手段)(聂宏毅、李彬 2008, pp.1—34)。但是,这些研究的特点为,首先,具体的个案研究的任务,在于详细追踪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的对外决策的过程、动机和影响因素。换言之,在这些研究中,对于历史事实的描述要远远重于经验规律和因果机制的总结。其次,这些研究大多为单个个案研究,并没有集中所有个案研究,或进行比较历史个案研究。从而,这些研究并没有从一个总体问题,亦即中国对外武力使用问题出发,来总结一般性的结论和模式。或许受研究资料和方法所限,学者个案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毛泽东时期,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个案并无太多研究。所以,历史学者和少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历史过程和事件起因的剖析,而没有总结出核心的、一以贯之的规律和特性(简要分析请见表3)。

表3 中国学者对于武力使用个案的研究简述

个 案	现有主要研究 ^①	简要评论
1950, 朝鲜战争	沈志华; 杨奎松; 徐焰等	主要是历史研究, 少数国际关系或政治科学的研究
1962, 中印争端	戴超武等	历史研究, 重于决策过程、相关因素的互动
1969, 中苏争端	李丹慧; 杨奎松; 徐焰等	少数历史学者的研究
1979, 中越冲突	没有代表性的著述	

自新中国成立以降,西方学者对中国武力使用风险接受的分析,路径各异,成果斐然。我们意在批判现有的研究,指出其解释力的问题和边界所在;

^① 代表性的成果如下:(1)朝鲜战争。沈志华(2007, 1999)、杨奎松(2009)、徐焰(1990)。(2)中印争端。戴超武(2004)。(3)中苏争端。沈志华、李丹慧(2006)、杨奎松(2009)、徐焰(1994)。(4)中越冲突。没有重要且有影响的著述。

同时,进一步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框架。首先,不少学者关注中国战略文化对中国决策与行为的影响。哈佛大学江忆恩的研究认为,中国是一种文化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所以中国的战略文化偏向于革命型。但是冯惠云则运用领导人的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分析,指出即使毛泽东时期中国战略文化也是防御性的(Alastair Iain Johnston 1995;江忆恩 2005;江忆恩 2009, pp. 206—252;冯惠云 2005, pp. 1—23;李晓燕 2006, pp. 141—165)。战略文化解释的路径可能存在系列的问题。比如,对于相同的时期(如毛泽东时期),不同的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研究文本和路径,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江忆恩和冯惠云就是这样的例子。而且,到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统一的,并且延续至今仍发挥作用,亦即影响当今中国对外决策者战略思维的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战略文化作为一种影响战略行为的理念因素,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文化道德主义”的战略文化,其实是与“农业文明”和“单极”霸权紧密相关。而当今美国所处的单极霸权地位,也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文化中,“文化道德主义”因素占据重要的位置(杨仕乐 2006, pp. 197—230)。战略文化的解释难以说明中国外交决策偏好的变化,亦即既然中国战略文化的结构因素长期存在,这只能说明中国武力风险偏好的静态特性,而难以解释变化;与此同时,难以说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法家思想对具体决策者的影响谁大谁小,两者又是如何具体互动的?对于诸如此类问题,上述解释尚难以提供确定答案。

第二,国内政治因素的解释。如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主权冲突问题上采取风险行为,是为了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亦即受国内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等因素的影响(Thomas J. Christensen, 1996; John W. Garver, 1992; 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1990)。①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的研究就是遵循这条路线,他对1958年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的决策分析,意在从国内政治的角度阐释对外使用武力,其实是转移国内视线,特别是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做铺垫的。这与传统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论断是一脉相承的。还有学者从地理因素、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中寻找中国对外武力使用的原因,另有学者探究公民与军事的关系因素对中国武力使用的影响;傅泰林则提出,中国在领域争端中的武力选择,受到国内政权

① 对外武力使用的国内根源分析,参见 T. Clifton Morgan and Kenneth N. Bickers(1992, pp. 25—52)。



稳定以及中国相对力量变化因素的影响(Andrew Scobell 2003; George Segal, 1985; M. Taylor Fravel, 2007/2008, pp. 44—83)。然而,国内政治的解释并不具有恒定性,比如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反而是影响到了中国统一大业,这说明对外使用武力的决策,实际上并不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反而影响到国内政权建设、稳定与合法性。国内政治的解释强调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与控制力决定着其对风险行为的接受程度,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解释,难以说明中国在最为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关系却相对平静。而且,中国政治控制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决定了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联不是那么直接。

第三,理性主义的解释及其他。受主流西方政治科学理论,亦即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中国对外武力使用最初的分析范式(也可以说是主流工具)大多为理性选择理论。比如,有学者把中国历次使用武力都归因为基于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实行的理性计算:或为先发制人,或为威慑和强制外交^①;或为制造惊恐等政治与心理冲击,或使用武力方式制造危机,或制造机会主义的时机(Mark Burles and Abram M. Shulsky 2000)。本文接下来第二部分将详细评述理性主义分析的弊端所在。也有学者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角度,分析中国对外使用武力与相关经济相互依赖水平结构之间的关系,认为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从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概率将下降(杨仕乐 2004, pp. 107—142)。经济相互依赖与对外和平主义的倾向更接近于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这又如何能阻止欧洲各国走向世界大战?孙学峰以领土敏感性和中国能力为维度,认为中国采取风险选择与敏感性、能力成正比(孙学峰 2008)。但事实上,朝鲜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未必是中国能力较强时。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中国未来领土纠纷、边界划定问题得以解决,那么是否中国就不会选择武力作为对外影响力手段呢?而且以敏感性作为原因变量,有同义反复之嫌,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为何中国在某些问题领域特别敏感,而对于另一些问题不甚敏感?不同时期敏感性的具体内涵的变迁机制是什么?等等。

冷战结束后,外交决策理论中多元启发(Poliheuristic)理论兴起,提出外交决策与选择是理性和认知因素的综合结果(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

^① 这些代表性成果可见 Allen S. Whiting(2001a; 2001b)。